

新闻出版总署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市场 社会 政府

——共和国60年发展理论解读

李友梅 徐中振 陆 铭 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新闻出版总署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市场 社会 政府

——共和国60年发展理论解读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社会、政府：共和国 60 年发展理论解读/李友梅，徐中振，
陆铭主编.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9

ISBN 978—7—5000—8238—5

I. 市… II. ①李…②徐…③陆… III. 社会科学—理论成果—中国 IV. C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7049 号

- 主 编 李友梅 徐中振 陆 铭
撰 稿 陆 铭 陈 钊 肖 瑛 黄晓春 商红日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李玉莲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5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18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8238—5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历史、现实与未来 /陆 铭

引 言	3
一、重新解读计划经济	5
二、理论进展与思想解放	9
三、政府推动的市场化改革：1992~1996 年发生了什么？ ...	12
四、经济分权体制的得失	18
五、走向平衡的经济增长	29
六、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几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36

从传统经济走向现代经济 /陈 钊

引 言	41
一、中国二元经济的历史起源	43
二、城乡分割下的城乡差距形成与扩大	46
三、全球化进程中的城乡和区域格局	49
四、城市里的社会融合与公共政策	57
五、新农村建设之路	64
六、从传统到现代：中国能否走向公正的市场经济	69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变迁 / 肖 瑛 黄晓春

引 言	83
一、总体性社会的形塑：社会生活被规制的过程	84
二、复调社会	98
三、社会变迁视角下中国社会学的命运、经验与前景	151

高度政治与低度政治 / 商红日

一、60 年政治学各说	179
二、中国 60 年变迁的扫描	199
三、解读中国 60 年：高度政治和低度政治的视角	220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历史、现实与未来

陆 铭

引 言

迈入 2009 年的中国站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她的 60 周年华诞。在共和国的第一个 30 年里，政府在所有的领域里，都用一只“看得见的手”支配着人们的生活。而在第二个 30 年里，中国政府却主动而广泛地退出了经济资源的配置，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逐渐长大，并且最终与“看得见的手”握在了一起。

站在“30 年”与“60 年”之间看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中国 30 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历史。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至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逐步减少，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范围和作用逐步扩大。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无论是企业领域，还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化是改革开放 30 年的大方向。但是，同样在这些领域，矛盾、问题和成就并存。当市场分割、户籍管制、房价上涨、公用事业垄断、公共服务低效、社会不公与收入差距扩大这些问题摆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意识到，构建一个良好运作的市场经济是如此不容易……

改革开放的 30 年里有没有“中国的奇迹”？就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而言，全世界都会认为这是个奇迹，但是到底怎么会导致这样的高速的经济增长呢？如果我们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增长的话，中国也没有什么特点，因为中国的增长无非就是在资本的高速积累（包括外资的进入和中国国内储蓄）的推动下产生的，再加上中国有人口红利，所以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的高速增长肯定会带来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的三个方面都符合经济学原理。第一个方面是所有制，特别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民营化进程，经济效率大大提高。第二就是开放，从 1978 年开始，到 2001 年加入 WTO，开放使得中国得以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第三点就是城乡和区域格局的大变化，如果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中国内地的廉价劳动力和来自于全球的资本在中国沿海地区的结合。

要理解中国过去 30 年的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从要素积累和结构调整的这样的传统视角出发。中国走过的显然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道路。对此，早在 20 多年前，美国政治学家汤森和沃马克就评论道，“这表明了一种日益增强的信念，即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它应当有一个不同的标签。”^① 如果真的需要这样一个标签的话，那么，这个标签就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而要理解中国市场经济的特色所在，则又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① Townsend, James R. and Brantly Womack, *A Country Study, Politics in China*, 3rd edition, Ly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6. 中译本，詹姆斯·R. 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 4 月版。

一、重新解读计划经济

今天解读计划经济的目的不是单纯地就历史谈历史。今天人们在谈中国经济的 30 年的变化时，有一种倾向，喜欢把 60 年完全割裂开，谈后 30 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的时候，把前 30 年抛开了。但是，回过头看计划经济，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目标开始讲起是非常必要的。第一代领导人有两个目标，一个是赶超目标或者追赶目标，在追赶目标之下更为具体的目标，就是构建中国完整而独立的经济体系。第二个目标相对来说没有第一个重要，但是对后来影响非常大，那就是平等目标。平等目标在两个维度上很重要。第一个是人与人平等。把解放前的社会结构完全颠倒了，其中对于经济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压低了教育的回报，教育、知识分子变得不值钱了，严重地影响人的工作积极性。还有一个平等目标对后来 30 年影响非常大，那就是地区之间的平等。当然，地区之间的平等还有一些军事、国家安全角度的考虑，但是，在客观上，通过内地的建设，三线建设缩小了地区间的差距。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对中国今天地区之间的格局和城市布局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从两个目标出发往下推一定是计划经济，用市场经济的方式这两个目标不能实现。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第一代领导人使用的手段就是计划加

国有。计划加国有的手段是用来扭曲要素的价格的。如果完全按照市场体制配置，中国是一穷二白的国家，资本匮乏，劳动力过剩，放在国际贸易体系里面，就不要搞重工业，不要搞化工、钢铁，但是这能在国际上有地位吗？能建成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吗？不行。第一代领导人很清楚，要搞重化工业，一定要搞资本密集型，那需要大量的钱。计划加国有的方式解决了国家的资本积累问题，一方面把农产品价格压得很低，把原材料、劳动力成本压得很低，人民币汇率严重高估，这些都是为了把生产成本压低，把利润做高，然后拿来投资。私有企业是做不到这些的，因为私有企业的钱不归国家，所以只能通过国有企业制度，将利润转移到国家的投资里面。相应地，在劳动就业领域，也一定要实行计划经济。因为国家拿走了利润，职工工资拿得低，作为补偿，国家再实施从出生到死亡，从摇篮到墓地的国家福利制度。^①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什么搞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跟计划加国有的旧体制背景有关。

第二个是城乡分割。我们的户籍制度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阻碍农民工进城。我们搞原始资本积累时，城市职工有社会保障和更好的待遇，如果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大家都到城市里面来，就业怎么办？重工业的发展导致工业创造就业的功能不够，连城市人就业都难以解决，所以通过户籍制度把城乡分开了。以户籍制度为手段的城乡分割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极其重大，这是需要专门讨论的话题。

第三个是中央向地方分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就保持了中央向地方分权的结构，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又是非常重要。中国从人口、疆域和经济规模几重意义上都是一个大国。在人类的前现代历史上，只有中国通过统一的文字和度量衡以及发达的交通网络降低了地区间的交易成本，从而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并且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其历史之悠久可以说举世无双。大国如何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这是一个经济学需要去回

^① 参阅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8 月版。

答的问题。中国在秦代建立起有利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自汉代起，通过部分恢复分封制实施了向地方的经济分权。自那以后，中国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一个在经济上分权，但在政治上集权的大国。中国古代有“皇权不下乡”的说法，也就是说，实际上在农业社会里，乡以下的经济社会运行实际上和政治是脱离的，地方官员的职责只是保一方平安。经济的分权有利于发展地方经济，政治的集权则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分权加政治集权的结构仍然被用于这个大国的治理。很多人认为，即使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经济体制也是独具特色的。虽然说中国从总体上照搬了苏联的“计划加国有”的经济体制，实际上，中国更加强调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苏联则更加重视中央计划的精确性。中央计划经济本来应该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而经济上的集权与政治上的集权相配套，成为苏联的模式。而中国的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如果中央在经济上统得太死，不利于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毛泽东早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就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可以说，向地方的分权早在建国初期就开始了。

苏联为什么后来改革始终不能成功，因为在他们的体制里面是所谓的“条条”体制，它的计划经济所实行的范围，计划价格实行的种类远远超过中国。用现在的市场经济来看过去，改革前是太“计划”了，但如果把苏联和中国相比，中国用分权体制保留了地方政府的激励，为后来改革开放的成功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中国所谓完整和独立的工业体系不是在国家层面，而是每个省都建立了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苏联是在整个国家有完整的工业体系，甚至是包括东欧国家大家一起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有分工。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都有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对于改革开放以后形成地区之间的竞争非常重要。

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领导人的目标，不能有市场，因为市场不能做这些事情。如果在市场体制下，中国违背自己比较优势生产出来的东西一定很贵，卖不动，所以计划经济加国有封闭有一定的道理。从理论的角度说，有一个背景，在共和国前 30 年计划经济时代，在经济理论上没有非常成熟的理论告诉我们当时的第一代领导人说计划经济不行。20 世纪 30 年代曾经有过一场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站在今天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看 30 年代的争论，发现当时的争论还是非常肤浅的，很多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同时，在实践上，苏联很成功。由于这些从理论到实践的背景，我们的领导人也有点对于计划经济过于相信。

但是回过头来看，我们要看计划经济怎么给后来 30 年的改革打下了基础？这一点必须要讲，如果不讲，我们会认为我们的改革就是市场的成功，实际上不是的。我们今天批评计划经济，也不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计划经济年代的遗产，主要是不好，但是有三条，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条，形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第二条，我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以后，消灭了民营经济、私营经济，但是没有从根子上消灭集体经济，我们在农村里面是有集体工业的，这被认为是解释中国改革成功而苏联不能成功的重要原因。因为有集体工业，一旦价格放开以后，形成了集体工业对国有企业的竞争。而苏联缺少这个，他们那里从工业到农业全是计划，培养不出来一个部门来跟计划部门竞争。第三条，也是改革前的成功经验，不得不承认，毛主席非常智慧，在计划年代，中国的分权结构和地方间竞争的格局已经形成了。

二、 理论进展与 思想解放

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很多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开始搞改革时候，关于计划为什么没有成功还没有很好的理论。当时，邓小平和陈云关于改革的看法是有些分歧的，邓小平认为中国需要改革是因为没有利用市场，而陈云认为计划之所以失败是没有把计划做好。邓小平也很智慧，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说了很多话，实际上起到了避免引起老革命家们发生争论的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对于解放思想特别重要。后来，邓小平又提出三个“有利于”，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也回避掉了。

今天可以说邓小平很智慧，但是无论国内经济学界，还是世界经济学界，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仍然没有提供很成熟的理论来指导改革，当时指导改革实践的就是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充满了实验主义的色彩。后来，必须要解决所有制的理论问题了，社会主义一定是公有制吗？民营经济发展起来了，私人个体户发展起来怎么办？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有。在企业部门，中国走的是放权让利的改革道路。所有制可以不动，计划经济也可以跟市场结合，在微观层面可以放权让利，把采购权、定价权逐渐放在企业，然后慢慢改。

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思想解释和理论突破是如何一步步走的。1979 年至 1984 年，是我国思想理论界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时期，理论界对计划与市场，以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人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市场的作用，计划与市场必须结合。当时甚至有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概念，但不可能被公开提出。当时，陈云认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在随后的多次重要会议上都基本上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方针。

1984~1987 年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利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1989 年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阶段。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对于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问题进行了新的概括和说明，报告认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相统一的体制，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即国家运用经济和其他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良好经济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

进入到第四个阶段（1989~1992 年），计划经济的思潮有所回潮。在 1990 年 12 月，有一个叫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的文件，从中可以看到计划经济的思潮有所回潮，对于市场和计划的认识甚至有所退步。

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期，由于实施了边际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在中国形成了具有鲜明的转型特色的“双轨制”，即计划轨和市场轨双轨并存。首先，我们从学理层面看看价格双轨制的改革。对双轨制合理性的论证，就是边际等价。经济学最精髓的就是边际分析，边际成本

等于边际收益是有效率的表现。在双轨制下，当人进行边际决策时按照市场价格，尽管计划内价格受到控制，但在边际意义上已经可以满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作为微观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目标能够实现，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双轨制的体制安排是具有帕累托最优性质的。

今天来看，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过渡到 20 世纪 90 年代就逐步“并轨”了。樊纲曾经提出，中国双轨制更重要的是体制双轨。如果把这个概念引进来，用更大的双轨制概念看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我看，到今天也没有完成。今天的双轨更多是体制双轨，而体制双轨更多是和身份、所有制这样的一些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的元素结合在一起。更进一步看，今天的双轨主要不是存在于商品市场，而是存在于要素市场。比如在资本市场，你会看到贷款对私有制企业是有身份歧视的。

接下来看双轨制改革的后果。双轨制有一个最大的不能解决的问题，万一出现寻租、串轨，怎么办？其实回顾历史，改革以后发生腐败，双轨制是非常重要的背景。我们今天市场体制的现状是一个权力和市场结合的现状，其实如果追溯历史，这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双轨制改革的时期。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因为权力介入，很快显示出它的不公平性，双轨制埋下了不公平的根源。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先富起来一批人，其实有两种性质，一种像“傻子瓜子”的年广九一样，靠自己的勤奋，还有就是“官倒”造就了一批富人，这批人在改革中获得租金，成为了后来不平等的根源。

三、 政府推动的 市场化改革： 1992～1996年 发生了什么？

在经历了 1989～1992 年间的市场经济的低潮期之后，邓小平于 1992 年春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巡讲话。在这里，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构想。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党的十四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1993 年 11 月 14 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遵循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把党的十四大所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和系统化。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全局性整体推进阶段。

我们再看看历史、现实和今天理论的进展，我就要讲到对市场经济体制认识的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最火红的理论是信息经济学，当时，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有一篇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综述，叫“质量取决于价格”，讲的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道理，由于不了解产品的质量，